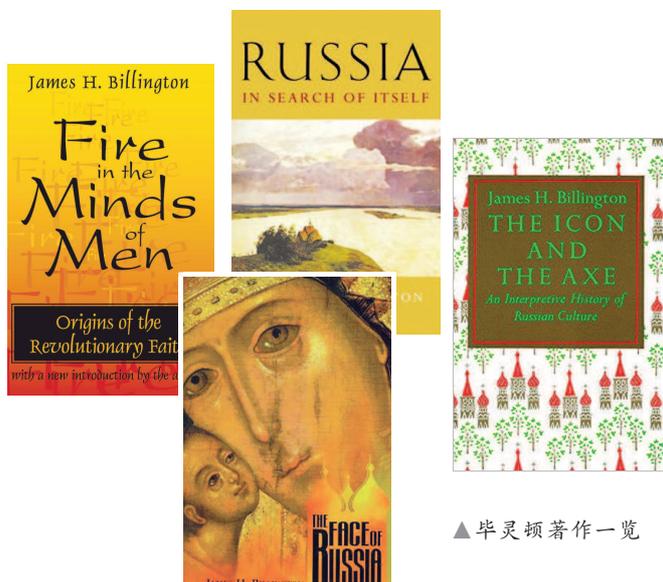


← (上接2版)

研究的中心之一。除此之外,毕灵顿先生任期内创建的许多计划和项目,包括“小说奖”(Fiction Prize,后来改名为“国会图书馆美国小说奖”)、“国家图书节”(National Book Festival,和前总统布什夫人劳拉共同创办)、“国家视听保存中心”(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Conservation Center)等,也都是围绕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而建立的。

其次,毕灵顿先生在任期间,极大地推动了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的空间当然远非一般的图书馆可比。但是,随着每年超过四百多个语种的巨量书籍采购和收藏,其储藏空间早已捉襟见肘。而数据库和电子化的技术应用,对于图书馆的发展已是不容回避的大势所趋。作为老派的学者,毕灵顿先生对于纸本图书情有独钟。他曾说过:“芯片不会取代图书。网络只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而知识和智慧终究要靠书籍来传达。”不过,他也看到图书馆空间限制对于图书数字化的要求,特别是从传播的角度,图书的电子化可以给世界各地的读者带来很大便利。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清醒意识,国会图书馆几个大型的书籍数字化工程,如“世界数字图书馆”(The World Digital Library)和“国家数字图书馆”(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作为完全向网络用户免费开放的电子



▲ 毕灵顿著作一览

数据库,都是在毕灵顿先生主政期间启动和实现的。甚至推特信息的收集和存储,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毕灵顿先生对于国会图书馆的转型和发展,还有很多贡献。比如,国会图书馆与一般的公立图书馆不同,其服务对象首先是国会议员。在这一基本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如何让国会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社会大众所用,毕灵顿先生对此也做了许多殚精竭虑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再比如,图书馆的年度预算需要国会的批准,对于争取尽可能多的预算支持,至少保证不被大幅削减,在说服国会议员的过程中,毕灵顿先生的个人影响力常常扮演重要角色。当然,庞大的开支完全依赖财政拨款有时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毕灵顿

先生向社会公众募款的能力,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克鲁格中心的成立,就是克鲁格家族6000万美元捐赠的结果。而用于建设“国家视听保存中心”的经费,除了国会8210万美元的经费之外,还有超过1亿5千万美元的捐赠。这笔募款,也成为国会图书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社会捐助。

由于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以及作为一位领袖人物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卓越贡献,毕灵顿先生一生所获各种荣誉不计其数。他拥有世界各地多所大学颁授的42个荣誉学位,以及包括美国哲学学会院士、美国文理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等多项学术头衔,还有包括美国总统公民勋章、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等世界多家政府机构授予的各种奖励。

当然,执掌国会图书馆如此之久,总不免众口难调,引起一些批评。我在那里从事研究期间,就听到一些议论。例如,由于募款的需要,毕灵顿先生不免要与一些富有的大亨打交道,比如索罗斯等人。如此就有人认为他有讨好富商之嫌。另外,虽然毕灵顿先生也积极推进图书的数字化,但有人认为他心里并不重视技术,一直未聘任长期固定的技术总监,以至于图书馆的信息系统时有故障。有一位当年克鲁格中心的工作人员Jason,起先负责中心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后来转任一所大学的学术岗位。在他的印象中,毕灵顿先生更像是一位启蒙时代的学人,而不像是一位21世纪的管理者;喜欢聆听长篇大论的学术报告,自己的谈吐也常常充满诗性的语言、历史的掌故以及哲理的分析;有着较为浓厚的精英甚至等级意识,对于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个人意见有着天然的抵触。不过,在表述了这种观察的同时,Jason也根据自己与毕灵顿先生的切身交往,尤其是基于毕灵顿先生对他职业生涯和个人发展的一再支持与照顾,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于毕灵顿先生的高度尊敬。Jason指出,毕灵顿先生所体现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正在被信息时代吞没;但正因如此,我们如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

在我看来,毕灵顿先生虽然具有公共服务的卓越

领袖才能,但骨子里恐怕仍是一个纯粹学人的气质。Jason形容毕灵顿先生的所谓“精英意识”、“启蒙时代的人物”,甚至在他看来与21世纪这个时代的落落寡合,其实都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其学人气质的表现。毕灵顿先生退休之前对于周围的一些非议,当然也有感知。他原本宣布在2016年1月退休,但却自己将正式退休的时间提前到了2015年的9月。需要指出的是,毕灵顿先生在任时,馆长一职还没有法定任期的限制,他若执意不退,非议者似乎也并无办法。但是,像他这样的学人,我想是不屑授人以柄,揣度其留恋权位的。他如此自处,恰恰是其书生本色和清高气质的反映。

毕灵顿先生的退休,似乎标志着美国国会图书馆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我当年赴任“克鲁格讲席”,可以说恰好见证了这一历史的转折点。既然躬逢其时,无论对于毕灵顿先生其人其事,还是国会图书馆的变化,都不免会有一些个人的感受。正如开篇所说,值此毕灵顿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我想记下我与他的一点学术因缘,同时向中文世界的读者介绍这位兼具杰出学人和公共领袖身份的卓越人物。在一个“天下多故”的时代,一颗理想主义的灵魂,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获得更好的安顿吧。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回顾与前瞻：“科学的春天”40年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许多科学工作者们至今难忘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当时在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场春风很快席卷全国,唤醒了科学工作的全面复苏,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40年来,纵观中国社会的每一点发展和变化,都与科学和思想的解放息息相关。

日前,以“改革开放40年:科技促进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会在同济大学召开。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见证者,来自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的近千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对40年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围绕市场主体,实现从“创新政策”到“创新发展政策”的拓展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如何更好地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和科技界对“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即看到“创新”是促进科技发展、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新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科大公

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方新教授指出,从1985年的决定到最近出台的文件,改革以“解放思想科技创新主体”为核心的基本问题没有变,但是内涵和解决方案却发生了变化:比如,在主要任务上,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今天“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在促进经济结合问题上,从过去动员科技人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到今天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重视加强创新主体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在资源配置上,从过去不断呼吁加大科技投入到今天更关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相比过去短期的政策,现在更关注基本制度的优化。这些措施的转变都极大地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在肯定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基础上,也对当下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在他看来,目前传统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对整个国际创新系统的效率提高仍有很大制约,国家创新体系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此外,创新要靠市场主体在市场环境中创作价值,但完善市场环境不健全已成为创新的最大障碍,如何消除低成本竞争、超期仿冒、不公平竞争等不良现象,未来需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多关注。他还指出,过去政策目标和手段是存在一定错位的:创新政策的目标是推动创新为经济建设服务,应围绕市场主体下功夫,但过去的改革手段仍

主要聚焦于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机构。过去我们未能真正区分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前者是如何将科研投入转化为知识,后者则是如何把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科研和创新政策的关系。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会党委书记、中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穆荣平研究员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状态(创新成为发展主要驱动力),也是一种发展方式(一切从创新的角度去思考)。和创新政策相比,创新发展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发展理念对于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产出价值判断的决定性影响,强调多元价值的创造,而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强调创新对于发展的作用绩效,而不仅仅是讲创新本身。在“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第一次把“创新能力”扩展到“社会能力”,指出创新不仅仅要为产业服务,还要扩展到

(下转4版) →